

Turning on the lights? Publicity and defensive legal mobilization in protest-related trials in Russia

本文作者

Renata Mustafina,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, Sciences Po, Paris,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ology.



一句话总结

民族志研究

在俄罗斯，“不可能获胜”的人权律师如何看待和使用“公开宣传 publicity”这一手段

必要的背景介绍

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法院

- 司法改革，引入了听证会制度，通过推特、新闻媒体直播庭审
- 法院不仅是镇压抗议的场所，也成为了社会运动家的舞台
- 双重法律体系：法院可以处理普通的案件，但在重要的/政治化的案件中服从当局的权威 (Hendley, 2009b, p. 340)

两个时间节点

- 2012年5月6日, Bolotnaya 广场的集会
- 2017年3月和6月反腐败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审判

本文关注的问题

- 俄罗斯的人权律师如何使用宣传这种手段?
- 双重法律体系中的政治审判如何运作?
- “不可能获胜的案件” “一切都是事先决定的”

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

法律动员 legal mobilization

- 主动型法律动员: 律师和社会运动家在庭审过程中利用宣传, 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
 - 赢得庭审、推动社会变革
 - 薪酬平等、LGBT权利、麻风病幸存者、劳资纠纷、烟草行业(Chua, 2014; McCann, 1994; Arrington, 2014; Gallagher, 2006; Barclay & Fisher, 2006; Mather, 1998)
- 被动型法律动员: 在高压环境下 repressive
 - 将庭审过程中的问题与更大的社会、政治、党派斗争问题联系起来
 - 通常针对陪审团、公众舆论
 - 芝加哥反越战活动人士、美国南方民权活动人士(Barkan, 1985)
- 案件特点对法律动员的影响
 - 在俄罗斯, 叛国罪相关的案件中律师会采取公开宣传的策略, 以促进公开调查(van der Vet, 2018)
 - 如果当局公开对案件定性, 律师则会避免公开宣传
 - 在中国, 公开宣传被用做一种表达的工具——“完全无望的案件”(Liu & Halliday, 2016)

俄罗斯的法律-社会研究

- "Telephone justice"
 - 苏联的传统, 法官受到非正式的影响和压力
 - “司法独立”的原因是政治家对法院冷漠
- 双重法律体系
 - 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正常方式解决
 - 少数备受瞩目的案件会被当局操纵结果
- 俄罗斯情况
 - 在刑事诉讼中, 辩护律师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
 - 但同时, 人权组织积极地建立律师网络, 为民间活动人士提供法律辩护
 -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对法律感兴趣, 而不是法律虚无主义(Hendley, 2017)
 - 公开宣传成为人权律师的武器之一

研究方法

- 民族志研究
 - 13个月3次实地考察，59次访谈
 - 在法院的工作、对被告的追踪、参加的听证会、对刑事辩护律师的采访等
- 两个重大的案件
 - 2012.5.6，在普京就任前一天的抗议事件
 - 2017.3.26-6.12，针对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调查

当局如何使用宣传？

- 2012年
 - 得到了当局的批准
 - 在B广场发展成了一次集会，引发了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
 - 当局明确对抗议者进行定罪：“参与大规模骚乱”，“对国家代表使用暴力”，“激进反对派的行为越界了”
 - 抗议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、颜色革命的危险
 - 随后开始刑事指控，检方掌握了主动
- 2017年
 - 当局没有批准在市中心集会，建议在偏远地区
 - 运动的带头人呼吁大家到市中心"take a walk"
 - 3.26，至少有1000人被捕；6.12，有679人被捕
 - 有4个人被刑事指控
 - 3月底被捕，4.13才有相关新闻发布，社会活动家和人权律师声称这是企图隐藏被捕者
 - 公开逮捕有利于被告
 - 启动了特别程序，为被告提供了机会
 - 2012年是集体审判，2017年个人审判

律师如何看待宣传？

1. 平衡控辩双方权力关系、促进调查公开

- 让公众监督法律程序、监督警察和执法人员的一种方式
- Why? Because it is always easier for the judge, for the investigation, **when nobody knows about the case**, and they do it quietly ... ssshhhh ...
- 向法庭传递信号：你们正在被监视、你们的行为接受公众审查
- ... **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a big uproar lightens the defendant's fate and slightly restricts arbitrary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**
- 但公开宣传不总是好的

2. 不同律师对公开宣传的看法

- Marina Travkina
 - 50岁，刑事辩护律师，对当局持批判态度，没有明确党派倾向，“对法院没有期待”
 - 公开宣传是有用的，但需要谨慎使用
 - 在2012年的案件中，默许了水族馆事件（让被告接受采访，讲述自己的经历）
- Rodion Mokhov
 - 40岁，general practitioner，2012年的案件是“恐吓的工具”但“案件本身是干净的”
 - 拒绝接受采访，拒绝发表评论
 - 跟检察官、法官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让案件“人性化”而不是“政治化”
 - 与亲政府的记者接触
- 好的宣传——关注案件调查；坏的宣传——将案件政治化

3. 2012年事件改变了俄罗斯的人权律师

- 苏联后期以来，俄罗斯的律师和人权活动家之间有密切的互动
 - 形成了一个以人权活动为主要领域的辩护律师（Marina Travkina）
 - “随时准备在法庭内外公开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并接受那些不可能获胜的案件”
- 2012年B事件以后，人权律师供不应求
 - 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接受人权案件（Robin Mokhov）
 - 模糊了“人权”案件和“刑事”案件之间的边界
 - “确实不可能获胜，但是有可能做些什么”
 - 重新确认指控、缓刑、软禁、监禁、认罪等
- 公开宣传的作用

不同领域的公开宣传

B事件以后的公开宣传导致参与案件的行为者增加，导致律师对案件的控制力减少，在法庭和公众领域引发了变化

1. 法庭之上：更多的行为者

- 俄罗斯的听证会
 - 场地允许，任何人都能进入
 - 可以录音，但禁止拍照
 - 对于抗议事件，法庭上可能充满了记者和感兴趣的公众
 - 消遣
 - 公众可能是非常激动的，可能在庭审中使用侮辱性的词汇
 - 公众更欣赏主动与法官对抗的被告（讽刺、挑衅、幽默），而不是被动听从律师建议的被告
- Artur
 - “没有必要惹恼法官”
 - 法庭上的情况可能导致法官“在判决中报复”
 - 一些律师试图接近公众，要求他们不要进入法庭
- 各种场外的因素都有可能对庭审产生影响

2. 法庭之外：公众领域

- 记者、人权活动家、公知企图让普京注意到B事件
- 案件早期在全国青年论坛上的提问：为什么有两个人没有集会但是被起诉了？
 - 普京：让检察官办公室核实，这是他们的职责
 - 两个星期后，两个人在缴纳保释金后被释放
- 新闻发布会上记者：参加抗议的人是否应该被关进监狱
 - 普京：没有，但“针对国家的暴力”是不能容忍的
 - 其中一名被告只被指控“参与骚乱”，第二天被指控“使用暴力”
- 模糊性、总统权威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律师“持续的焦虑”
- Elizaveta
 - 避免公开案件信息
 - “清除”她的被告的政治活动历史
 - 矛盾的心理：非常担心总统行为的影响，另一方面也指望总统的影响
 - 在推特上@普京总统关心被告的体检问题

结论和讨论

高压环境下律师对宣传策略的使用：公开案件还是避免引起争议？

- 既可能带来机会，也可能带来限制

关注“法律从业者”和“人权活动家”两个群体的交叉点

双重法律体系中权威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